

《内 经》 十 讲

任 应 秋

北 京 中 医 学 院 印

1 9 7 8 . 1 1 .

《内 经》十 讲

任 应 秋

目 次

一、什么叫《黄帝内经》？	1
二、《内经》成书的时代	4
三、《内经》引用的古代文献	11
四、《素问》《灵枢》的书名和卷篇	15
五、校勘《内经》诸家	18
六、注解《内经》诸家	22
七、类分研究《内经》诸家	26
八、专题发挥《内经》诸家	37
九、《内经》的学术思想	43
十、《内经》的理论体系	48
附：略谈色脉诊	56
关于八纲辨证	65
虚实补泻赘言	68
临证点滴	74

一、什么叫《黄帝内经》？

祖国医学现存的古典文献中可以称“经”的，仅有以下几种：

1. 《黄帝内经》
2. 《黄帝八十一难经》
3. 《神农本草经》
4. 《伤寒论》
5. 《金匱要略方论》
6. 《中藏经》
7. 《脉经》
8. 《黄帝针灸甲乙经》
9. 《黄帝内经太素》

虽然有九种，除《神农本草经》外，其余几种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于此便可以看出《黄帝内经》的重要性了。其它几种究竟如何研究《黄帝内经》？如何发挥《黄帝内经》？另作专题来介绍，暂且不谈。先从《黄帝内经》本身有关的几个方面，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者有助于我们这次的学习。首先谈谈“什么叫《黄帝内经》”的问题。

要弄清楚什么叫《黄帝内经》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叫“黄帝”？旧的历史学家都把黄帝当做了了不起的圣人来看待的，如《帝王世纪》说：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力收、常先、大鸿、神农皇直、封鉅人镇大山稽鬼，夷区、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黄帝一号帝鸿氏，或曰归藏氏，或曰帝轩，吹律定姓，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御览》卷七十九引）

这完全是神话式的描述。但历代史学家往往引此以为根据。惟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黄帝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圣人，而是远古时代的一个氏族。《中国通史简编》说：

“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河北宣化鸡鸣山）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族（南方蛮族之一，约为九个部落的联盟，首领即蚩尤）和炎帝族（西戎羌族的一支，传说炎帝姓姜，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古书中有关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嫫祖（黄帝正妻）养蚕，仓颉造文字，大桡作甲子，伶伦造乐器。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黄帝为始祖）。这”

传说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第三节：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

黄帝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伟大的氏族，历史中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族文化的代表。所谓仰韶文化，就是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遗址中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多种。石器有刀、斧、杵、镞、镰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陶器有钵、鼎等形制。仰韶文化散布在广大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已被确定的有数十处。从这些遗址和多量的遗物里，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一）农业在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多有石斧，因它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遗址多在河谷里，因土地肥沃，宜于种植。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560公尺，南北约八百公尺，许多小屋接连，已形成一个村落。西安半坡村遗址，生产工具有石斧、骨锄，还有一陶钵粟。

（二）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猪、马、牛的骨骼，猪的大量饲养，说明生活已相当安定。

（三）手工业：陶器、陶片最多，且多有纹饰。纺轮、骨针等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成为普通的手工业。

（四）弓箭的使用：有了弓箭，狩猎生活逐渐过渡到原始畜牧业。

（五）货物交换：甘肃各遗址墓葬中，多有玉片、玉瑗、海贝，尤其海贝应从新疆来，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交换关系。由于交换关系的继续发展，氏族内部逐渐分化，而且开始有了奴隶。

（六）艺术：陶器一般是美观的，纹饰杂以犬羊图形，并有人形纹。

仰韶文化距离现代约有四五千年，据上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来看，农业、畜牧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部门，陶器、武器和一般工具，种类颇多，说明手工业也在发展。药物的发现，医药经验的积累，这时完全有这一可能。因此，《帝王世纪》说：

“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御览》、《路史》、《初学记》等都有引）

这个传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黄帝氏族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从无到有的盛况也是空前的，所以历代的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为了溯本思源，各方面的文献往往都冠以“黄帝”字样，以示学有本根，就不足为奇了。即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以神农黄帝名书的实在不少。如：

道家有：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杂黄帝》五十八篇。

阴阳家有：

《黄帝泰素》二十篇。

《黄帝》十六篇。

农家有：

《神农》二十篇。

小说家有：

《黄帝说》四十篇。

兵法家有：

《神农兵法》一篇。

天文家有：

《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历谱家有：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篇。

五行家有：

《黄帝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杂占家有：

《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

医经家有：

《黄帝内经》十八卷。

经方家有：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房中家有：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神仙家有：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歧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以上充分说明诸家均托言黄帝以成书，或托言神农以成书，其朴素的意义，仍不外溯源崇本而已。《淮南子》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卷十九《修务训》）

“尊古贱今”的人是有的，但不能说都是如此。例如每个汉族人无不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就不是什么尊古的问题了。

至于古代的医书，如何叫做《内经》呢？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来看，便可以一目了然。目录是：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看来“内”和“外”，只是相对之称而已，别无深义，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都是同一意义。正因内外是相对之称，如果犹有不能包括的内容，故白氏又设“旁篇”以概之。至吴昆的《素问注》，王九达的《内经合类》并云：“五内阴阳之谓内”，张介宾《类经》谓：“内者，生命之道。”作为后世的一种理解则可，命名的初义未必如此。经字，孔安国训为常，刘熙释为径，陆德明《经典释文》则谓：“经者，常也，法也，径也，由也。”这些意义，都有可取，因古人往往把具有一定法则，又为一般所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书籍，都称做经，高深的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之类，浅近的如《三字经》《四字经》之类，《内经》便属于前者。有人认为经和纬也是相对之称，所以既有经书，又有纬书。但是，毕竟经书在前，纬书在后，故纬书都是解释经书的，如《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均属之。即是说先有《易经》之后，再以《易纬》配之，先有《书经》之后，再以《书纬》配之，与《内经》、《外经》同时出现之义迥别，故“经纬”之说，不足以释其义。《艺文志》说：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这是关于人体生理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脏腑学说。

“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这是讨论病机。“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这是立法施治，处方遣药。脏腑、病机、治疗，是学习医学最基本的一系列问题，称之为经，是适当的。与今日所见到的《黄帝内经》的内容，是完全复合的。可惜《艺文志》所载的医经七家，仅存《黄帝内经》一家了，其它六家，均已佚逸，无复存者。

二、《内经》成书的时代

《内经》之所以加上“黄帝”名称，仅仅就是个“溯源崇本”的意思，也就是藉以说明我国的医药文化渊源甚早。它既非是言实有黄帝之圣，留下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也不等于说《内经》是在黄帝时代就有的。那末，《内经》这书究竟著作于什么时代呢？据宋臣高保衡等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时写的序文说：

“或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

说明早在公元十一世纪中期就有人怀疑《内经》不是黄帝著的书，而是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的。但是宋臣高保衡等对这一怀疑，是抱的否定态度。他们说：

“人生天地之间，八尺之躯，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十二经之气血大数，皮肤包络，其外可剖而视之乎？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尽管他们对“似出战国”之说持否定态度，但说无论据，仅凭空说一些“大圣上智”、

“最出远古”一类浮泛虚饰之词而已。揆诸实际，“似出战国”这一怀疑的提出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亦不能谓为尽出于战国。正如吕复说：

“《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指《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的《黄帝泰素》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语），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沧洲翁传》引）

因此，关于《黄帝内经》成书的时期问题，就不能简单化，必须按照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即是要按照《内经》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如《内经》有《素问》《灵枢》两大部分，两部份又各有八十一篇，即非出自一时，更非出自一人，便不能不按其内容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了。下面先谈谈关于《素问》的著作时代。

《素问》的成书期，总的说来，一般都倾向于是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时代的作品。先看看宋人的意见：

邵雍，字尧夫，宋·范阳人，精于《易》学，是百源学派的宗师，著有《观物篇》《皇极经世》等书。他就在《经世》书里说：“《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见卷八下《心学第十二》）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亦精于《易》学，著有《识仁篇》《定性书》等。他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见《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

司马光，字君实，宋·夏县人，曾相宋哲宗，著有《资治通鉴》。他与范景仁书云：“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见《传家集·书启》）

朱熹，字元晦，宋·婺源人，为宋代理学大师，著作甚富，经后人整理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其《古史余论》云：“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指黄帝）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

再看看明人的意见：

方孝儒，字希直，明·宁海人。著有《逊志斋稿》《侯成集》《希古堂稿》等，他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故其书虽伪，而其人近古，有可取者。”（《逊志斋稿·读三坟书》）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明·桐城人，著有《通雅》《物理小识》等书，其于《通雅》云：“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再看看清人的意见：

魏荔彤，字念廷，清·柏乡人，著有《伤寒论本义》《金匱要略方论本义》。其于《伤寒论本义·自序》云：“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

崔述，字武承，清·大名，人，于所著《补上古考信录·黄帝说》云：“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

通过上述诸家的证明，《素问》这书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否百分之百都是呢？又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了。

现存《素问》的全部内容，可把它分做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即除开七篇大论

以外的，基本都是，可以把它叫做《素问》的前期作品。上述诸家所说《素问》成书于战国，就是指的这部分前期作品而言。内容最多，凡七十余篇，其中某些主要内容，与同样是战国时代书的《周礼》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证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例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碱，调以滑甘。”（《周礼·食医》）

而《素问·金匱真言论》则略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又例如：

“四时皆有疢痢，春时有疢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疢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周礼·疾医》）

而《素问·金匱真言论》即言“春气者，病在头”，惟“夏取分腠，治在肌肉”，出自《灵枢·寒热病》，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疾所发之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复谓“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其言四季之疾之相同又如此。

《周礼·疾医》仅言“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而《素问·藏气法时论》即统言“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矣，并具体提出：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周礼·疾医》仅言“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而《素问》则述之更详。例如：

《平人氣象论》云：“肝脏筋膜之气，心脏血脉之气，脾脏肌肉之气，肺行营卫阴阳，肾脏骨髓之气。”

此所谓五气也。又如《阴阳应象大论》云：

“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笑，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

此为所谓五声也。又如《五脏生成篇》云：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羔者生，黑如鸟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青如草兹者死，赤如衄血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周礼·疾医》还说：“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而《素问·六节藏象论》云：

“自古通天者，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

《金匱真言论》则略谓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耳，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二阴。目二、耳二、鼻孔二、口一、前后阴共为九窍。上窍七，下窍二，当其有病变，必两参之而不失。又《六节藏象论》云：

“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

王冰解释说：

“形藏四者，一头角，二耳目，三口齿，四胸中也，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也。”

当其有病变也，或诊形藏部位之脉，或诊神藏部位之脉，亦必两参之，斯为万全。

看来《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

《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

再以《史记·扁鹊仓公传》为证。它说：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得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

扁鹊对齐桓侯辨证和论治的理论，可说均出自《素问》。《缪刺论》说：

“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

扁鹊所谓的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完全是将《缪刺》理论在临证的具体运用。《阴阳应象大论》还说：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扁鹊以汤熨治腠理，以针石治血脉，以酒醪治肠胃，在骨髓则无奈之何的理论，与此可谓毫无二致。以此说明《素问》的成书，决不会后于扁鹊。

再可以《素问》的文体为证。先秦之文，多作韵语，除五经而外，他如《文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鹖冠子》《鬼谷子》等，都是如此。而《素问》的《上古天真》《四气调神》《生气通天》《阴阳应象》《脉要精微》《三部九候》《宝命全形》《八正神明》《离合真邪》《刺要》《刺禁》《调经》诸论，其中作韵语的文字特多，都非后世之文所可比拟的。特别是《八正神明论》最末一段云：

“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歧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谓神？歧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真、文、元交错相叶，古韵铿锵。无怪顾亭林说：“其文绝以《荀子·成相篇》。”（见《日知录》卷二十一）《成相篇》是《荀子》书中最出色的一篇韵文，亭林以之比拟，其推崇之意，可以知矣。

综观以上三点，《素问》的第一部分，以《周礼》《扁仓传》注明其学术思想，并从其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均出于先秦，并不可能迟于扁鹊以后，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素问》的第二部分，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得先师所藏之卷。还包括《六节藏象论》前面一段，也就是“歧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至“孰少孰多，可得闻乎”七百十六字，据林亿等的新校正云：“全元起注本及《太素》并无，疑王氏之所补也。”其内容又与大论之文相同，新校正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此，也把它算做第二部分。看来这第二部分，全是王冰所补的。但王冰究竟根据什么来补的呢？林亿等说：

“《素问》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晋人也，序《甲乙经》云亦有亡失。《隋书·经籍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无第七。王冰唐宝应中人，

上至晋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余年，而冰自为得旧藏之卷，今窃疑之。乃观《天元纪大论》《五运行论》《六微旨论》《气交变论》《五常政论》《六元正纪论》《至真要论》七篇，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王冰序注新校正）

我基本同意“新校正”的看法。至于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五运六气的规律和变化，及其对人体疾病的影响。《素问》里一再提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既见于《举痛论》，又见于《气交变论》），更提到“人与天地相参”（见《欬论》），即是说人位置于大自然之中，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必然很密切，人便得从认识自然的规律入手，进而参于大自然的变化，使人能更好地生活于大自然之中，这就是讲五运六气的基本精神。既承认几篇大论是古医经之一，那末，究竟古到什么程度呢？是否如缪希雍所说：

“原夫五运六气之说，其起于汉魏之后乎！何者？张仲景汉末人也，其书不载也”。（《本草经疏》）

张仲景书不是不载，而是载的较少。例如《金匱要略》云：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谓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谓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这完全是讲的运气的内容，不信，请看赵以德的《衍义》说：

“考之《内经》，候气至不至，有谓四时者，有谓五运者，有谓六气者，发明详矣。至四时，则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六甲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而各从其主治焉。求其气之至也，皆从春始，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素问·六节藏象论》）。然在脉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内。在‘五运相袭，而皆治之’。（《六节藏象论》）终期之日，阳年先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太过；阴年后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不及。与其年和，则非太过不及而平。与司天地气不和，则胜而报复，复则郁发，待时而作，作则风湿燥热火寒之气，非常而暴（胜复郁发诸气，均见《六元正纪、至真要》两论）。在六气，则曰六气之胜。‘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之类（见《至真要大论》）。其在脉应则曰：‘厥阴之至弦，少阴之至钩，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则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见《至真要大论》）。由是观之，仲景言四时之定法者，若遇气运加临主位，则必将奉天政之寒温，虽与四时气有反者，难为逆时也，候同也。且《经》曰：‘主胜逆，客胜从’（见《至真要大论》）。又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常政大论》）。此又不在独守四时之气，而参之以运气者矣。”

赵氏《衍义》以运气说释仲景是正确的。因“至而至，至而不至”等提法，基本就是从《六微旨大论》来的，并不是仲景的创说。仲景即曾言运气，则运气说自当在仲景之先，而不是如缪希雍所说，是在“汉魏之后”。又先到什么时限呢？从七篇大论以甲子纪年来说，

不会晚于东汉。因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八五年)颁布四分历,便已开始用甲子纪年了。虽然说甲子纪年是从东汉章帝始,不等于说运气也是从这时开始,只能说运气学到了东汉章帝时采用了甲子纪年的方法,因这一方法比用“岁阳岁名”纪年,即有意义,而又方便的多。又如运气中纪月的方法,都是正月建寅,二月建丑,三月建辰,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颁布太初历就开始了,所以不能把它推到章帝以后去。再从文字气象来说,几篇大论中的有韵之文,比之于第一部分诸篇,并不减色。例如《天元纪大论》云:

“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生,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以上元真合韵)。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即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阳部韵)。”

又如《至真要大论》云:

“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上声鱼部韵)。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支脂通韵)。”

因此,我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至迟亦应该断至东汉以前。

综上所述,《素问》的成书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至东汉一段时间,经过多数医家,逐渐汇集而成,这是就笔之于书而言。至其学术思想,以及许多内容的流传,应当说要比这早得多。因笔之于书时,不可能都是各个医家的创说,而是各有师承和祖述的。

至于要明确《灵枢》的成书年代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灵枢》的真伪问题。自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灵枢》是“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中抄出之文。”元代吕复指《灵枢》系王冰以《九灵经》之更名(见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清代杭世俊《道古堂集》说《灵枢》“文义浅短,为王冰所伪记。”但晁、吕、杭三氏之说,是否可成立呢?答案都是否定的,请看下列三家所论,便明白了。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

“愚案《灵枢》即《针经》,见于《汉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序,并非后出。《灵宝注》以针有九名,改为《九灵》,又以十二经络分为十二卷,王冰又因《九灵》之名而改为《灵枢》,其名益雅,其去古益远,实一书也。请列五证以明之。

皇甫谧《甲乙经》序曰:‘《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歧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为十二卷。’今检《甲乙经》,称《素问》者,即今之《素问》。称黄帝者,验其文即今《灵枢》,别无所谓《针经》者,则《针经》即《灵枢》可知,其证一也。

《灵枢》卷一,《九针十二原篇》已云‘先立《针经》,’是《针经》之名,见于本书。其证二也。

王冰云:‘《灵枢》即《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与皇甫谧同,当是汉以来相传之旧说,其证三也。

杨尚善隋初人也,所著《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中土久佚,今由日本传来。其书采录《灵枢经》文,与《素问》不分轩輊,与《甲乙经》同。是汉唐人所称《内经》,合《素问》《针经》而言,非专指《素问》明矣,其证四也。

《灵枢》义精词奥,《经筋》等编,非圣人不能作,与冰《素问》注相较,精粗深浅,相去悬殊,断非冰所能伪托,其证五也。”(见卷七《灵枢经跋》)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又补充陆氏的第一第三两点说:

“夫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为《内经》,王冰以《素问》《灵枢》为《内经》,

《针经》《灵枢》卷数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谧去古未远，其言当有所受之。冰遽于医学，唐时《针经》具在，必不舍流传有绪之古书，而别指一书以当《内经》，断可识矣。

《玉海》卷六十三引《书目》（按即《中兴馆阁书目》）云：‘《黄帝灵枢经》九卷，黄帝、歧伯、雷公、少俞、伯高问答之语，隋杨上善序：凡八十一篇，《针经》九卷大底同，亦八十一篇。《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按今本《灵枢》，实以《九针十二原》为第一篇，而无《精气篇》，与《中兴书目》不同，盖《书目》据杨上善本，今所传为史崧所上，乃别一本也。《精气篇》疑即今之《决气篇》篇中首论精气），又间有详略。王冰以《针经》为《灵枢》，故席延尝云：‘《灵枢》之名，时最后出’（《汉艺文志考证》卷十引较略，《宋史·艺文志》席延尝《黄帝针经音义》一卷），是《灵枢》即《针经》，宋人书目，具有明文。其时《针经》尚存，以之两相对勘，见其文字相同，实一书而二名，故能言之确切如此。’

以上陆心源的五证，和余嘉锡的辩证，完全足以说明《针经》《灵枢》，名虽二而书实一，或者说是同一书的两种本，决不是两种不同的书。这一点已经豪无可疑的了。至于有人说《灵枢》的文字比《素问》浅薄，因而怀疑其为伪出，如吕复、杭世俊、日本丹波元简父子都有这一论调，究其实质，并不如此。正如黄以周所说：

“或又谓《素问》义深，《九卷》义浅。夫《内经》十八卷，乃医家所集，本非出一人之手。论其义之深，《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九卷》之于《素问》，同属《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黄帝骨度、脉度、筋度之问，而无对语，王注以为具在《灵枢》中，此文乃彼经之错简。皇甫谧谓《内经》十八卷，即此二书，可谓信而有证。《素问·针解篇》之所解，其文出于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论》言：合五诊，调阴阳，已在《经脉》。《经脉》即《九卷》之篇目，王冰注亦言之，则《素问》之文，且有出于《九卷》之后矣。《素问》宗此经，而谓此经不逮《素问》，可乎？”（见《傲季文钞·黄帝内经九卷集注序》）

黄氏说：“《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灵枢》最前面十篇大文从《九针十二原》到《经脉》，浩浩瀚瀚，其笔仗的坚峭朴厚，比之《素问》诸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本输》《小针解》两篇，境界之大，气势之雄，实为两经之冠。所以周学海说：

“非三代上不能作，非三代上之圣人不能作。《尔雅》尚难抗行，世必谓秦汉诸子为之，试取《吕氏春秋》《淮南子》诸篇及郑孔注疏读之，岂能望其肩背？”（见《内经评文·灵枢》）

“圣人”之说虽不可取，其文章气象，确是秦汉以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义。相反，如《素问》的《宣明五气》《血气形志》篇，篇法文势，都较卑弱，而《灵枢》中的《外揣》《背腧》《寒热》诸篇，亦直与之等。故从文章方面来作《素》《灵》两书的比较，是没有多大优劣之分的。因而《灵枢》晚出之说，亦不能成立。当然，它亦和《素问》一样，个别的内容，是比较晚的。如《阴阳系日月篇》说：“寅者，正月之生阳也。”显然是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以后的记载。于此，我的结论是：《灵枢》基本上是《素问》的姊妹篇，并不比《素问》晚出。《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灵枢》各居其九，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灵枢》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渗入了汉代的東西，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

最后谈谈《素问遗篇》的问题。

《素问》中有《刺法论》和《本病论》两篇，据王冰编次本来说：《刺法论》居七十二，《本病论》是第七十三篇。当王冰次注的时候，这两篇已经不存在了，仅于目录中保存两论的篇名，并注明“亡”。但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又附列这两篇，并另题名为《素问遗篇》。温舒里居不详，帷前有元符己卯（哲宗十四年公元1099年）自序，并题朝散郎太医学司业。林亿等校《素问》时，亦曾见到，故其“新校正”略谓：

“详此二篇，亡在王冰之前，按《病能论》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阙第七二篇，’谓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问亡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

两篇内容，主要是讲运气升降，迁正退位的问题，其辞理确是鄙陋，不能与两经相比。究为何人所伪，不得而知。惟周学海说：

“二篇义浅笔稚，世皆斥其伪矣。揣其时当出于王启玄之后，刘温舒之前，决非温舒所自作也。时有古义杂出其间，如入疫室者，先存想五脏之神，见于《巢氏病源候论》，即其分辨五疫五疔，成于三年，俱卓有精义，必有所受之矣。第篇中仅排次其位，而无所发明其理，注中更引用咒语，尤为鄙俚。故二篇者，纪数之文也，不当以义理绳之。”（《内经评文·素问遗篇》评语）

要之，《素问遗篇》肯定是伪书，其所伪的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内容的实际意义不大，惟传“小金丹”一方，时或有用之者。

三、《内经》引用的古代文献

由上所说，无论《素问》或《灵枢》都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先先后后经过若干人之手，逐渐整理补充而成，从《素问》来说，全元起注本的篇卷，与王冰注本的篇卷大不一样，从《灵枢》来说，据《中兴馆阁书目》所载：“《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而现存的《灵枢》，首篇却是《九针十二原》，但又无《精气篇》。证明两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经过若干次不同的整理、修订，方流传到现代的。据两书现存的内容看来，他们从成书到修订的过程中，是采用了不少当时还存在的若干古代文献的，甚至可以说这些文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素问》成书的基础。因为全部二十一种文献，都出之于《素问》，仅其中的《刺法》，兼见于《灵枢》。兹将各个文献分别叙述如下：

（一）《五色》

（二）《脉变》

（三）《揆度》

（四）《奇恒》

这四种文献，首见于《素问·玉版论要篇》它说：“《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马蒔注云：“俱古经篇名，《灵枢》第六卷有《五色篇》。《经脉别论》亦有《阴阳》《揆度》等名。”（见《素问注证发微》）顾观光《素问校勘记》同意马蒔的看法，认定是“古经篇名”。《五色》是否即《灵枢》的《五色篇》，难作定论。但是《史记·扁鹊仓公传》阳庆所授淳于意的书中，确有《五色诊》一种，并记载其善以“五色

诊病”，故可知其为属于望诊古籍。且下文有“容色见于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一段，也足以证其为望色古籍无疑。

《脉变》，从下文“搏脉痹蹇，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孤为逆，虚为从”一段看来，也就是一部讲脉搏变化的古籍。

《揆度》除见于《玉版论要》外，再见于《疏五过论》和《病能论》。《揆度》究竟是什么样的文献呢？《玉版论要》说：“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病能论》说：“揆度者，切度之也。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即言是切求其脉理和度病之浅深，似仍属于脉法古籍的范围。

《奇恒》在《素问》里凡四见。一见于《玉版论要》，再见于《病能论》，三见于《疏五过》，四见于《方盛衰》。什么叫奇恒？《病能论》解释说：“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顾观光又解释说：“奇恒，谓异于常也。疑《素问·奇病论》即奇恒书之仅存者。《史记》述仓公所授书，有《奇咳术》。疑奇咳即奇恒。”咳，应作核，许氏《说文解字》云：“奇核，非常也。”因此，奇核与奇恒，实为同义词，说明《奇核术》与《奇恒》，有系同一书名的可能性。

（五）《九针》：这一文献在《素问》中，凡三见。一见于《三部九候论》：“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再见于《八正神明论》：“《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三见于《离合真邪论》：“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前言“众多博大，不可胜数”，这里又说“九九八十一篇”，看来《九针》的内容是不少的。

（六）《针经》：亦见于《八正神明论》：“帝曰：‘愿闻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张介宾解释说：“此云《针经》为古法，可见是书之传，其来最远，似犹有出轩岐之前者。”在第二讲中曾谈到，《灵枢》《针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一书而二名，是否即此《针经》，尚未敢必，但观其以“古法”称之，其流传之久远，似无疑义。

（七）《热论》：出《评热病论》：“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王冰注云：“《热论》，谓上古《热论》也。”而本篇又名《评热病论》，又引用了《热论》的文句，似乎旨在发挥《热论》中的精义者。

（八）《上经》

（九）《下经》

（十）《阴阳》

（十一）《从容》

并称这四部文献，见于《阴阳类论》，它说：“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

《上经》：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病能论》：“《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再见于《气交变大论》：“《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三见于《疏五过论》，四见于《阴阳类论》，只是两论仅提到《上经》之名而已。若据《病能》及《气交变》所言。今《素问》中《生气通天论》的内容，颇与之接近。

《下经》：在《素问》里凡五见。一见于《逆调论》：“《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再见于《痿论》：“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肉痿者，得之湿地也；骨痿者，生于大热也。’”三见于《病能论》：“《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四见于《疏五过论》，五见于《阴阳类论》，后两论仅提及经名而已。据前三论所言，《下经》可

叫做病症学或病理学。如其谓“胃不和卧不安”，以及对筋、肉、骨诸痿的分析，今天用于临床，都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

《阴阳》：在《素问》里凡四见，一见于《病能论》：“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在《奇恒》《阴阳》中。”王冰注云：“《奇恒》《阴阳》，上古经篇名，世本缺。”再见于《著至教论》：“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三见于《阴阳类论》：“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四见于《解精微论》：“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顾名思义，《阴阳》当是阐发阴阳学说的古经，从《素问》以阴阳名篇诸论的内容来看，都可以测知。

《从容》：如上所述，《阴阳类论》《解精微论》都提到了《从容》这个文献。特别是《阴阳类论》还说：“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张介宾为之解释云：“颂，诵同。《从容》之道可诵，其为古经篇名可知。如《示从容论》之类是也。以合《从容》，合其法也。”今《素问》的《示从容论》，主要是讲通过脉症的观察，进行分析病变的问题。果尔，则《从容》当属于辩证一类的典籍。

(十二)《脉经》：《示从容论》说：“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张介宾注云：“古有《脉经》，意即《脉要精微》《平人氣象》等论之义。”

(十三)《脉法》：《五运行大论》云：“《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

(十四)《脉要》：《至真要大论》云：“《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从以上三种脉书的存在，说明古代对脉学的总结，由来已久，而《素问》言脉学内容的丰富，亦不难理解了。

(十五)《形法》：如上所述，《形法》出于《解精微论》，从论中所言悲哀喜怒、观神察色的内容来看，或即古代观察形色之法的典籍。

(十六)《本病》：《痿论》云：“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王冰注：“《本病》，古经论篇名也。”今《素问》二十一卷，犹存“本病论篇第七十三”的篇目，并旁注“亡”。说详见第二讲有关《素问遗篇》中。

(十七)《阴阳十二官相使》：《奇病论》云：“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王冰注云：“言治法具于彼篇，今经已亡。”所言治法，是指胆虚气上溢而口苦，取胆经的募俞以为之治，则知所言阴阳指脏腑，十二官即指脏腑所主诸窍。据此，其内容已可以知其大略。

(十八)《金匱》：《病能论》说：“《金匱》者，决死生也。”可能似《内照法》一类的典籍，但无从考。

(十九)《太始天元册文》：《天元纪大论》云：“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王冰注云：“《天元册》，所以记天真元气运行之纪也。此太古占候灵文，已鐫诸玉版，命名册文。太古灵文，故命曰《太始天元册》也。”应属于古代天象学的典籍。

(二十)《大要》：在《素问》中凡两见，一见于《六元正纪大论》：“《大要》曰：

‘甚纪五分，微纪七分，其差可见。’再见于《至真要大论》，论中凡五次引用：1、“《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2、“《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3、“《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4、“《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5、“《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以上或言方制，或言诊法，或言四时，或言六气，或言病机，看来《大要》所具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二）《刺法》：在《素问》中凡四见：一见于《评热病论》，再见于《腹中论》，均言“论在《刺法》中。”王冰均注云：“今经亡。”三见于《奇病论》，略谓“《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四见于《调经论》：“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

在《灵枢》中凡两见：一见于《官针第七》：“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再见于《逆顺第五十五》：“《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以上二十一种远古文献，均出自《素问》，仅《刺法》兼见于《灵枢》。说明《灵枢》成书较早，无从引用上述文献，《素问》成书略晚，便得以充分引用上述文献。正因为《素问》晚出，所以它还引用了《灵枢》的内容。如《疟论》云：“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而《灵枢·逆顺第五十五》有曰：“方其盛也，勿取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则《疟论》所称之《经》，即《灵枢经》也。又《至真要大论》云：“《经》言盛者写之，虚则补之。”而《灵枢·大惑论第八十》便有“盛者写之，虚者补之”之语，可见《至真要》所称之《经》，仍然是《灵枢经》。《至真要大论》又云：“《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而《灵枢·禁服第四十八》有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命曰平人。”则《至真要》所引，实《灵枢》之节文耳。《素问》既一再地引用《灵枢》之文，谓其后出，自无疑义矣。

又《素问》中还有多处引用远古经论，尚不知其出处的，如：

《离合真邪论》：“《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荣输’。”

《调经论》：“《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六元正纪大论》：“《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

《至真要大论》：“《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

《解精微论》：“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

以上说明《内经》引用的远古文献，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素问》虽由代远年湮，仅存吉光片羽，正因为如此，所以弥觉其太可珍惜了。